

關於昭和初期「近代超克」論的一個考察 ——內藤湖南與東方文化聯盟⁺

陶德民^{*}

近年來，關於竹內好的國際研討會在德國海德堡大學（二〇〇四年）、中國上海（二〇〇五年）和日本名古屋愛知大學（二〇〇六年）等處相繼召開。隨之，戰前的「近代超克論」再次受到了人們的關注。¹

「近代超克」論的提出本身可以說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一個政治事件。即《文學界》雜誌社於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召開「近代的超克」座談會，出席者有《文學界》同人、「日本浪漫派」文學家和京都學派的哲學家等十三人。座談會上的發言和論文於該雜誌同年九月號和十月號刊出，河上徹太郎在「結語」中指出，座談會是在「大東亞戰爭」開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偷襲珍珠港，日本天皇發佈對英美宣戰詔書）所引起的「知的戰慄」仍在持續時所舉行，而會議記

錄則為「日本人的血」與「西歐知性」的「相剋」。而津村秀夫的〈應破甚麼〉一文，更直接道出了所謂「近代超克」論的政治含義所在：²

我們最大的敵人可以說是美利堅主義。進而言之，我們的命題是人間精神應該如何與物質文明及機械文明作戰。一般所說的美國流的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在根柢上亦與此有關。而這物質文明及機械文明的高度發達又為金融資本家和資本力的放任跋扈提供了最好的舞台。〔……〕這次大戰正是軸心三國面對世界相的末世性墮落奮然而起，訴諸最後手段的一場鬥爭。

⁺ 本文係二〇〇八年十月卅日本院儒學討論會內容。

^{*} 關西大學文學部中國語中國學專修課程教授、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¹ 參見鶴見俊輔、加加美光行（編著）：〈序〉，《無根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を超えて——竹内好を再考する》（東京：日本評論社，2007年）。

² 河上徹太郎等：《近代の超克》（東京：富山房，1979年），頁135-136。

不過很顯然的是，「近代超克」論也包含了超越現實政治的廣泛的思想含義，即對席捲整個世界的西方近代的文明和文化形態及其實質加以反思和批判。這也就是戰後日本以及美國的思想界一再對「近代超克」論加以分析，以「救出」其中合乎情理之部分而予以重新評價的基本理由。³

筆者則試圖根據新發現的有關內藤湖南與東方文化聯盟的史料指出，在一九四二年即昭和十七年召開的上述座談會的內容，其實在昭和初期即昭和時代的第一個十年之中已經可以找到與之呼應的廣泛的思想根源。

一九二六（即大正末年、昭和元年。同年十二月改元）年一月上旬，內藤在《大阪每日新聞》上連載〈關於民族的文化與文明〉一文，發表了他為期一年的歐洲旅行的觀感，提出「工藝品乃測量各國文化程度之尺度」的觀點，並據此對他所認定的文明強大而文化貧瘠的英美加以批判，議論之中含有即便從今天看來也頗為發人深省的觀點，有些甚至可以稱之為「後現代主義」和「環境保護主義」的倡言。

近代文明雖有以工業的進步作為標準來衡量國民水準的傾向，但這絕不是正確的見解。以批量生產為主體的工業有磨滅人類個性的傾向，故這並不符合人類真正進步的主旨。最終，能夠滿足個性要求的工業

必將興起。而工藝作為其中間產業，最後必將導致工藝的手工化。⁴

〔在見過巴黎各處精美的雕刻後〕倫敦市內各處的銅像、石刻等之拙劣和馬虎令人吃驚，遠不如日本這方面有希望。在看了博物館等以後，更覺得日本在古代雕刻等方面要優秀得多。由此，不禁產生了對英國國民的侮蔑之念。特別是當時溫布利在開英聯邦博覽會，〔……〕就今日生產的日常手工藝品來看時，印度不用說，緬甸等國的生產品也有不少蘊含著英國人不可企及的藝術趣味。由此，對英國人統治印度這樣的文化古國到底是否合理一事也發生了疑問。⁵

與此〔依靠大量佔有殖民地和天然資源而富強的英美〕相比，日本可謂處於非常不幸的位置，缺乏天然資源，占有的殖民地也不值一提。必須單靠國際貿易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致富。盡管如此，我卻為這日本的貧瘠而禮贊。雖然今日在歐洲沒有可與英國之富強相比肩的，但倘若英國就此滅亡，那它到底為世界文化做出了何等程度的貢獻，究竟會留下些什麼呢？這是很值得質疑的。美國就更加不值一提了。⁶

3 有關「近代超克」論的文獻，可參見竹內好：〈近代的超克〉，收於家永三郎（編）《歷史的概觀》，《近代日本思想史講座》，第7卷（東京：筑摩書房，1959年）；廣松涉：《「近代的超克」論：昭和思想史への一視角》（東京：朝日出版社，1980年）；Ryoen Minamoto (源了圓), "The Symposium on 'Overcoming Modernity'," in James W. Heisig and John C. Maraldo (eds.) *Rude Awakenings: Zen, the Kyoto School,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Harry Harootunian, *Overcoming by Modernity: History,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Interwar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近代による超克：戰間期日本の歴史・文化・共同體》，梅森直之（譯）（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子安宣邦：《「近代的超克」とは何か》（東京：青土社，2008年）等。

4 內藤湖南：〈民族の文化と文明とに就て〉，收於內藤乾吉等（編）《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東京：筑摩書房，1969年），頁147。

5 前掲文，頁142。

6 前掲文，頁141。

要之，東洋尤其是中國、日本等地的文化生活，在數千年前已經完成了從原始生活進入文明生活的過程，超越了所謂文明生活的利用厚生，較早地關注生活的趣味性及藝術性。不是滿足於征服天然，即利用高度發展的人工力量，而是進一步地將天然醇化，致力於保護和發展天然，最終目標是與人類所選擇的最好的天然同化並生活其中。如此的文化，是那些把利用厚生這一中間過程當作文化生活的主體，並以此為最佳的歐洲人尤其是美國人所無法想像的。⁷

如果說，內藤在一九二六年對英美的批判主要是在於文化論層面上的話，他在一九三一年的一次演說中對英美以及整個西方的批判更深入到文明論的層面，對構成近代西方文明之骨架的政治經濟組織的原理提出質疑。

大體說來，歐洲近代的政治經濟組織，以中世紀末期的新領土發現為其第一原因，「漸次經由從新領土獲取天然產品、以殖民政策開發農業、販賣本國的工業產品和進行資本投入等階段，」數百年間，在本國有人口增加、生產發達、資本增殖等不斷進步，而無停滯不前之現象。政治方面也隨之而把政權漸次從地主轉手與資本家以至勞動者，在發揮人的才能這一點上也無停滯不前之現象。而人們相互之間也形成了有進取心和才能者最能施展其力量的組織，並把由選舉產生代表者視為最高的政治組織。然而最近的社會狀態就連在殖

民地也漸漸現出窮途之勢，在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階級鬥爭愈演愈烈的情況下，那些由選舉造成的政治組織是否可算最善的組織實在很值得懷疑。〔……〕〔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也〕在六七十年間經歷了與歐美同樣的過程，而現在的窮途之勢所帶來的弊害想必也是要同樣承受下去了。⁸

那麼，如何擺脫困境，形成新的治經濟組織的原理呢？內藤把目光投向東方，包括古代的印度和日本以及現代的滿洲，舉出以下三個例子。

第一，古代印度的佛教僧團「在內部採取了最為平和，不會引發競爭心的生活方式，對外則憑借各自的才能獲得國王和人民的信仰，使佛法得到推廣。這就說明，即使不採取選舉或者其他各種鼓舞競爭心的方法，人類也是可以達到進步的。」

第二，前近代的日本是憑氏神中心的村落組織而運轉的，「不依靠選舉或是其他各種競爭方式來開展行政，這種和平自治的形態在今天也相當值得參考。」

第三，從奉天城外清真寺的長老處得知「有一套針對穆罕默德教徒的交通組織」。即滿洲的回教徒不去使用現代的汽船，而是依靠各地回教村落的網絡，利用沿岸各地的木船，化費很長時間前往麥加朝聖。

7 前掲文，頁151。

8 內藤湖南：〈東方文化聯盟に関する鄙見〉，收於內藤乾吉等（編）《內藤湖南全集》，第6卷（東京：筑摩書房，1972年），頁154-155。

「在信奉速度和力量的現代還有這種交通組織的存在，作為一種維護自己信仰的宗教和禮儀的方法，這是否對如今這個無視宗教無視道德，只朝功利的方向前進的時代，會帶來了一些教益」？⁹

內藤的這個題為「關於東方文化聯盟之鄙見」的演說，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內藤於大阪召開的東方文化聯盟成立大會上發表的，形式上是對流亡日本的印度獨立運動領袖李斯（Rash Bihari Bose）所作主題報告的評論。

其實，內藤並不是應邀來會上演說而已，他本人就是該聯盟的主要發起人和理事之一，聯盟的名稱是他所命名，聯盟的宗旨（加強亞洲各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進而實現共存共榮）也得到他的修改潤色，刊登在每期聯盟機關刊物的扉頁上。所以，說他是這個組織的精神領袖，也決不過分。¹⁰

在上述演說中，內藤聯繫到李斯的主題報告「文明之母：亞細亞」，並重申他在〈關於民族的文化與文明〉一文中的見解，指出：

即便憑我極少的經驗，也能列舉一二東方諸國諸民族的可取之處。除此以外，在各式各樣的生活方式和風土民情中，應該還有更多值得學習的地方。所以，我們能夠感覺到東方文化聯盟這樣的組織並不是無意義的。我們以今日成立的文化聯盟的微薄之力為基礎，盼望

那些中了現代的社會體系和經濟體系的流毒，即所謂強國之國民做出最痛切的反省，為這個聯盟的前途而祝福。並且再次感謝李斯先生，用印度的文化帶給我們這樣一個反思的機會。¹¹

如此看來，即使英國通過近代的科學及經濟體制在政治上壓迫、征服了印度，但是很顯然地卻無法征服其文化，無法征服文化便稱不上是真正的征服。所以可以斷言，一旦有機會，英國必然會失去其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征服力量。李斯君懷有強烈的愛國心，宣導印度的獨立，在印度也有著許多與之共鳴的年輕人。我們堅信李斯君有一天終究會達成他的目標。¹²

這樣看來，內藤由於參與東方文化聯盟的籌建以及與李斯等印度獨立志士的接觸，確實在思想上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他對日本追隨西方，無視宗教無視道德，只朝功利的方向前進的近代化路線敲響警鐘，並意識到包括自己在內的中了現代的社會體系和經濟體系的流毒的所謂強國之國民有必要作出反省。儘管他後來對滿洲國的建立發出歡呼，並對其建國方針提出建議，他這一段的思想言論仍不失其重要性，而且他的一些建議，比如不要把日本的地方選舉制度移植到滿洲國，以便防止在地方自發的自治組織以外又形成一套地方議會，從而對人民造成雙重負擔，正是建立在這一段思想基礎之上的。¹³

9 前揭文，頁 156-158。

10 關於東方文化聯盟形成的動因、過程和活動的詳情，參見陶德民：〈內藤湖南と東方文化聯盟——昭和初期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の一形態〉，《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 3（2008 年 12 月）。

11 內藤湖南：〈東方文化聯盟に関する鄙見〉，頁 158。

12 前揭文，頁 154。

13 參見陶德民：〈「近代」への執着と反省——内藤湖南の中国観の射程〉，《明治の漢学者と中国——安澤・天囚・湖南の外交論策》（吹田：関西大学出版部，2007 年）。

所以，雖然內藤當時並沒有使用「近代超克」的字眼，他的以上思想和主張都是著眼於克服近代文明所帶來的弊病的。因此，不妨稱之為昭和初期的「近代超克」論。

內藤的「近代超克」論不僅包括對日本自己的所作所為作出反省的因素（雖然還嫌流於抽象），而且至少還對印度的獨立運動予以了同情和支持。與此相比，正如子安宣邦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昭和第二個十年即戰時的「近代超克」論者雖然猛烈地抨擊英美，卻對日本正在對中國進行的大規模侵略戰爭隻字不提，置若罔聞，因而難以避免人們對其立論的唯我獨善之性格的指責。¹⁴

14 參見子安宣邦：〈中国の戦争の事実誰が正面したか——座談会「大陸政策十年の検討」〉（第四章）、〈宣戦になぜかくも感動したのか——「支那事变」と「大東亜戦争」との間〉（第七章），《「近代の超克」とは何か》。

